政治科學論叢／第二十二期／民國 93 年 12 月／頁 1～30

論中共的「和平崛起」*

蕭全政**

壹、緒　論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黨校前副校長鄭必堅曾在「博鰲亞洲論壇」，針對「中國的和平崛起」，進行專題演講；同年十二月十日，中共總理溫家寶在哈佛大學的演講，亦對「中國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做出綱要性的闡述。自此之後，中共的「和平崛起」論，即被定位爲新的國家發展戰略，而深受各國與各界的矚目與討論。

在各國與各界的反應中，東協國家領袖、老布希總統、日相小泉純一郎，及美國國防部長倫斯斐等，都曾肯定、歡迎中共所宣稱的「以和平的方式追求發展」。相對的，學術界和輿論界亦針對「和平崛起」的概念，進行很多的討論；其中，包括相關概念的釐清，如和平崛起的意義、和平與崛起及和平與戰爭之間的辯證關係（龐中英，2004；閻學通，2004），也包括對和平崛起的策略與路徑（孫哲，2003；時殷弘，2004），及其可能面臨的政經限制與障礙等的分析（學習時報，2004；石曉虎、司銀濤，2004；沈君山，2004）。然而，綜合而言，這些論述五花八門，有的更是南轅北轍，尤其他們經常各有所偏，而使人仍難以瞭解中共「和平崛起」論的整體性與複雜性。

中共的國家發展戰略，向來深受國際政經變遷的影響，而且亦左右其

---

* 本文爲蕭全政教授於民國 93 年 9 月 30 日應國立台灣大學「連震東先生紀念講座」法政講座之邀請，於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發表之演講。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爲政治經濟學、台灣戰後的政治經濟發展、中共的經濟改革、亞太經濟合作；著有《政治與經濟的整合》，《台灣地區的新重商主義》，《台灣新思維：國民主義》等書。

臺灣學術期刊資料庫

對內與對外的政經政策。例如，在一九六四年後國際上的南北對峙中，毛澤東爲領導南方國家（後來稱第三世界）與美蘇爭霸，而有「三線戰略」與文化大革命下強調「閉關鎖國」的自力更生；而在一九七〇年代末蘇聯的積極對外擴張中，鄧小平採取聯美制蘇策略，並開始推動改革開放；另外，鄧小平也在九〇年代初的「中國威脅」論與「和平演變」論下，推動「反和平演變」與二次改革開放。

從一九七八年底開始推動改革開放以來，中共的內外政經結構與內外政經關係，早已出現非常劇烈的變化。二十五年來，在國內層次，誠如二〇〇三年十二月溫家寶在哈佛大學的演講中所說的，中共已吸收、運用五千億美元的外資，而且達成平均 9.4%的高經濟成長率（溫家寶，2003：3），並因而經歷激烈的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上的變遷。另方面，在國際層次，一九八〇年代末後的冷戰終結與蘇聯的解體、一九九七年的東亞金融危機、二〇〇一年的「九一一」事件，及二〇〇三年的美伊戰爭等，亦分別衝擊中共的國際政經關係，並影響其國際政經地位。爲因應這些劇烈的內外政經變遷，中共會調整其國家發展戰略；這似乎是很自然的例行公事，但是其調整的具體內容到底是什麼，卻是值得我們細心探究。

據報載，隨著中共十六大（二〇〇二年十一月）後「胡溫體制」的形成，胡錦濤曾要求前中共黨校副校長鄭必堅，負責爲其建構「中國的和平崛起」理論（聯合報，2003/12/16，版 13），以鋪陳新的國家發展戰略。爲何是鄭必堅奉命去建構這個理論呢?根據另一個報導，因爲鄭必堅曾在二〇〇二年年底訪美，深切體會一些美國政要與學者，包括季辛吉、布里辛斯基和萊斯等，對於「中國威脅」論的不安，以致於在回國的報告中提出相關的建議（新聞周刊，2004）。然而，無論是爲新政權而提出的新戰略，或是爲了淡化各國所擔心的「中國威脅」論，中共的確在鄭必堅的領導下，於二〇〇三年的十一月之前，已大致上完成了「和平崛起」的理論，而且得到「胡溫體制」的支持；故除溫家寶的哈佛演講之外，二〇〇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胡錦濤也在紀念毛澤東誕辰 110 周年的座談會上，強調要堅持「和平崛起」的道路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中共的「和平崛起」論，做爲一種國家發展戰略，無論對其自身或對外界而言，顯然都具有重要的意義；特別是對於台灣而言，不管是就兩岸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經貿、投資關係的發展，或對兩岸政治、安全關係的改變，都將產生非常直接的作用，甚至可能因而影響台灣的內外政經政策與政經變遷。然而，一直到今天，該理論的確切內容，對於外界而言，卻仍然是相當的模糊；從戰略的角度看，誠如老子（三十六章）所說的，「國之利器不可示於人」，中共是不可能毫不保留的將其國家發展戰略公諸於世，故其模糊性似乎是必然的，只是我們不能不設法儘量釐清。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三日，鄭必堅在「博鰲亞洲論壇」介紹「中國的和平崛起」論時特別強調：這是二十五年來，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後所開創的一條適合中國國情，又適合時代特徵的戰略道路。這條道路的基本特質，包括：一、同經濟全球化相關聯而不是相脫離；其次，在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的同時，走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三、這是一條奮力崛起而又堅持和平、堅持不爭霸的道路。另外，圍繞這條道路的，他又強調，還包括三個最重要的戰略方針：一是推進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爲基本內涵的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以形成實現和平崛起的制度保證；二是借鑒吸收人類文明成果而又堅持宏揚中華文明，以形成實現和平崛起的精神支柱；三是統籌兼顧各種利益關係，包括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改革開放，以形成實現和平崛起的社會環境（鄭必堅，2003）。

同年十二月十日，溫家寶在哈佛大學的演講，希望大家「把目光投向中國」，看看「今天的中國，是一個改革開放與和平崛起的大國」，而「明天的中國，是一個熱愛和平和充滿希望的大國」；「中國和平崛起發展道路的要義」，就「在擴大對外開放的同時，更加充分和自覺地依靠自身的體制創新，依靠開發越來越大的國內市場，依靠把龐大的居民儲蓄轉化爲投資，依靠國民素質的提高和科技進步來解決資源和環境問題」。另外，溫家寶也強調中華文化的「和而不同」，而主張以平等和包容的精神，開展廣泛的文明對話和文化交流（溫家寶，2003）。

中共到底要如何在「和平」中「崛起」？如何在「改革開放」中，走出「獨立自主」的道路？鄭必堅所指出的三個戰略方針，到底如何使中共能和經濟全球化相關聯而不是相脫離，而且從中定出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呢？而更重要的是，在強調「和平崛起」的同時，中共在二〇〇四年的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防預算，比往年更大幅度的擴張而成長 11.6%；那麼，中共所追求的「和平崛起」，到底又是什麼樣的「和平」，而她又能如何堅持和平而且不稱霸呢？另外，鄭必堅所提的三個戰略方針，基本上仍比較偏向國內層次的政經社文事務，而在其所相對應的國際層次，如堅持和平、平等和「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上，中共又可能有何戰略性的思考呢？這些似乎都是必須進一步釐清的。

中共的國家發展戰略，必然有其因應國內外政經變遷的考慮，也有其整合國內與國際層次的策略性思維。本文希望從後冷戰時代的國際及中共的政經變遷中，嘗試定位並釐清中共的「和平崛起」論。在第二節中，本文將從區域主義的角度，分析冷戰時代的東西對抗與南北對峙如何消融於冷戰終結後區域主義的三元對立中，而且展現所謂「一超多強」的局面；而第三節將分析冷戰終結對於亞太政經結構與政經關係的衝擊，特別是涉及經濟合作的三種區域主義的發展，及隱隱約約中逐漸出現的亞洲主義與亞太主義之間的對立。其次，以涉及軍事安全的海陸爭霸爲重點，本文第四節將探討美、日所代表的區域內海洋勢力之爭霸策略與爭霸態勢；而第五節則在分析中共所代表的區域內大陸勢力之因應措施與爭霸佈署，特別是一九九五、九六年台海飛彈危機後中共對其內外政經戰略的全面性調整。基於當前的國際與亞太政經趨勢，本文第六節將分析中共「和平崛起」論的主要內涵；而在第七節，亦將附上簡單的結論，並在最後討論其內在上的一些重大困難與矛盾。

貳、後冷戰時代三元區域主義下的全球化與區域化之爭

二次大戰之後，以美、蘇爭霸爲核心的東西對抗，事實上是循著政經意識形態和地緣政治特質上的差異而開展，並因而展現東西兩大陣營間的冷戰對峙。一九四四年布列敦森林（the Bretton Woods）會議的召開與一九四七年關稅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的簽署，使西方陣營確立以國際貨幣基金會（IMF）、世界銀行（World Bank）和關稅貿易總協定（GATT）爲主軸的國際經濟秩序，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對開發中國家產生較爲不利的偏差，並對絕大部分的社會主義國家產生排擠作用。另方面，一九四七年，隨著蘇聯對西歐與南歐的擴張，美國發表杜魯門主義（the Truman Doctrine），開始推動圍堵政策，並先鞏固其後院，而與拉丁美洲諸國簽署美洲共同防禦條約，且於一九四九年與大西洋周邊盟邦合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一九五〇年六月韓戰爆發後，美國又先後與日、韓、菲、澳、台等太平洋國家，簽署雙邊共同防禦條約，並促成東南亞公約組織在一九五四年的出現。相對的，在蘇聯的主導下，代表東方集團的華沙公約組織（the Warsaw Pact），亦成立於一九五五年。整個冷戰時代的東西對抗，反映的其實就是來自兩大洋（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資本主義勢力對於歐亞大陸（Eurasia）社會主義陣營的圍堵，而有海陸爭霸的形勢與格局。在此其間，全球的政經脈絡與政經關係，基本上是被此東西對抗的形勢一分爲二，儘管其間還有較次要的、因經濟發展程度的差異，而出現的南方國家與北方國家之間的南北對峙關係。

然而，在一九八九年底的東歐自由化、美蘇馬爾他高峰會之後，這種強調兩元對立的東西對抗，已開始日趨鬆解；而後續的東歐民主化、兩德統一，更加速此兩元體系的崩潰。一九九〇年十一月，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與華沙公約組織的成員國，在巴黎簽署「歐洲裁減常規軍備條約」和互不侵犯的聯合聲明，正式宣告冷戰的終結；自此，列強之間所反映的國際政經關係與潮流，遂由政治與軍事的對抗，逐漸轉變成經濟的合作與安全的諮商。此一潮流，歷經一九九一年的波灣戰爭和蘇聯解體後，顯然更爲確立，而使整個國際局勢邁入所謂「一超多強」的後冷戰年代。

冷戰終結後的經濟合作與安全諮商，基本上是以區域主義的方式而進行，無論是在全球層次或在亞太地區，似乎都是如此。區域主義作爲一種政經形構，對於區域內外的不同成員，都隱含有不同的政經利害得失，因而可能引起相應的聯合與衝突。首先，成員國家間基於共同利益而進行的區域內合作，本質上將因競爭或對立而不利於非成員國家。故每一種區域主義，無論是依地域或成員身份爲基礎，必然涉及成員與非成員之間的利害競爭和衝突，例如原產地的規定即屬如此。其次，由於個別條件與特質的差異，區域主義所隱含的合作和競爭關係，也會在成員間或非成員間帶來不同的利害得失關係。另外，從功能性角度看，區域主義的內涵，主要

臺灣博碩士學位論文 加值資料庫

涉及政治、經濟和安全三個層面。對於特定國家而言，此三個層面同時涉及其整體的生存與長期的發展，但是此三層面之間的輕重緩急，及其該以何種區域主義的方式或對象進行合作，卻深受各國的國際政經環境及其政經特質的制約；而值得強調的是，此三層面相互之間，尤其是表現在結盟對象或結盟關係上者，並不必然是完全平行而對稱的。

從全球的角度看，在經濟合作上，自一九八〇年代中期後即快速發展，並於一九八九年底後更形制度化、組織化，且於一九九三年底後，已有歐洲聯盟（EU）、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及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等三元對立的局面。基本上循著地緣經濟上的考慮，這些經濟合作組織吸納了地緣上相近的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即過去的北方國家與南方國家），而 EU 更以關稅優惠的方式，結合了很多過去是屬她們殖民地的國家；其中，最特殊的是 APEC，因爲它包括了各種代表東、西、南、北方的國家。從特色上看，EU 和 NAFTA 都主要是由已開發國家所構成和主導，故明顯具有全球主義傾向，而 APEC 的大部分成員卻是開發中國家，以致於對全球主義多所保留，而甚至有保護性區域主義的傾向。由於三大區域及其成員特質的差異，她們在強調且強化經濟合作的同時，實際上卻使相互之間的競爭遠比過去還激烈；因爲在東西陣營相互對抗與南北集團相互對峙的年代，過去的經濟性競爭，基本上都只限於同一陣營或同一集團之內，但在全球化的年代，儘管強調經濟合作，競爭卻存在於區域之間與區域之內，而展現是一種全面性的競爭。

另方面，在安全諮商上，歐洲安全合作理事會（CSCE）已更形建制化，而於一九九三年成爲歐洲安全合作組織（OSCE），並開始分工執行集體安全防護事務；而亞太各國亦以歐洲安全合作理事會爲典範，於一九九三年宣布成立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CSCAP），而東協國家亦極力促成東協區域論壇（ARF）的出現。這種經濟與安全合作的趨勢，無論是在國際或在亞太層次，都顯然已徹底打破過去東西對抗的情勢，也改變南北對峙的局面。二〇〇四年五月一日後，EU 從十五國擴增爲二十五國，並將在二〇〇七年變成二十七國；而 NAFTA 也將在二〇〇五年，和中南美洲各國合組一共包括三十四國的美洲自由貿易區（the Free Trade Area of the Americas）。

臺灣博碩士學術期刊資料庫

說來矛盾，區域主義的快速發展，大部分的原因是出於各國爲因應全球化潮流的挑戰。自一九七〇年代末兩次石油危機之後，整個國際經濟生態出現劇烈的變動；以柴契爾政府和雷根政府爲代表的已開發國家，首先推動以解除管制和民營化政策爲特色的新自由主義，而觸動了全球化的契機。加上資訊、通訊科技的發達與普及，因此，從福特主義（Fordism）到後福特主義（post-Fordism）、從工業化到後工業化、從貨品貿易到服務貿易、從金融的疆域化到國際金融的一體化、從現代化到後現代化與虛擬化，整個人類歷史已在九〇年代初後逐漸邁入複雜多變的全球化潮流中（Peck & Tickell, 1996）。區域主義，透過規模的擴大（水平整合）與結構上的整合（垂直整合），而提昇資訊化、彈性化，及時空相對化時代的效率與競爭力；這完全符合全球化時代一般企業與政府的期待，也難怪一九九二年歐洲單一市場要具體形成的前後，相關的歐洲各國因而出現激烈的企業併購風潮。從此觀點看，在九〇年代初之後，區域主義原是已開發國家爲因應全球化、推動全球化的一種權宜，但也提供加盟的南方國家一種緩和全球化潮流衝擊的場域；然而，區域主義並不因此而從本質上化解南北之間的矛盾。在盛行區域主義的年代，南北之間的對峙關係，事實上只是內化而不是真正消融於各種區域主義之中；當然，這種現象也存在於以全球主義爲訴求的世界貿易組織（WTO）之內。

一九九三年，爲儘早結束 GATT 烏拉圭回合貿易談判，美國曾利用 NAFTA 的形成，迫使 APEC 加速合作而且提昇位階（包括超越一般性的溝通，而討論政府採購與通關便捷化方面的合作，及經濟領袖會議之召開等）；繼而積極利用提昇位階的 APEC，迫使 EU 國家在農業貿易上的讓步，而共同推動全球主義的發展。一九九五年 WTO 成立之後，美國更利用其資訊、通訊、科技與金融上的優勢，主導全球化下的經貿與投資，並護衛全球化潮流的發展；當然，一九九九年 WTO 部長會議在西雅圖的癱瘓，及二〇〇三年墨西哥坎昆（Cancun）年會的挫敗，都表示以南方國家爲代表的反全球化勢力的不可忽視。然而，由美國所主導，加上 NAFTA、EU 及 APEC 中的 OECD 國家，全球化的潮流仍然是一股沛然而莫之能禦的大趨勢。另方面，兩次波灣戰爭的開打及全球性反恐怖主義的推動，都更確立美國在軍事外交上的「單邊主義」之原則與實力，而鞏固其冷戰後

臺灣博碩士學位論文期刊資料庫

「一超」的地位；此「一超」的地位，到目前爲止，和全球主義與全球化的趨勢，顯然是相輔相成的。

參、亞太地區的區域主義化與隱約中的兩元對立

相對的，對於亞太各國而言，冷戰體系的崩解，不僅帶來 APEC、ARF 與 CSCAP 等表示經濟合作與安全諮商的潮流，但也爲區域內各國帶來全新的衝擊與挑戰，包括各種區域主義之間的爭鬥。冷戰時代的東西對抗，曾使東亞各國，從東北亞到東南亞，沿著海洋與大陸的邊緣一分爲二；這種對抗關係非常強烈，迫使各國相互之間及其內部的各種衝突與機會全被壓制。冷戰的終結，直接鬆解了這種一分爲二的壓力；而過去所有被壓制的，包括各國相互之間及各國內部的種種矛盾與機會，亦逐漸全面性的爆發。其中，經濟的合作和安全的諮商顯然比以往更爲加強，但是，涉及各國之間的疆域、主權、邊界和島嶼主權等方面的衝突，及各國內部的種族、階級、宗教、文化、民主政治與經濟發展等方面的矛盾，亦明顯的比以前更增加。

爲了有效化解國內外的這些衝擊與衝突並善用各種機會，冷戰終結後的東亞各國，幾乎都紛紛回到主權國家的基本立場，而重新重視特定疆域、特定人民及主權與政府之間的整合，並重新檢討且調整其涉及生存與發展的內外政經政策與戰略。這種趨勢，意謂著「民族國家」這個概念或組織，實際上仍扮演著相當積極、重要的角色，而不同於一般全球化主義者所主張的「民族國家的終結」（大前研一，1996）。在此其中，除了東帝汶的獨立外，一般而言，區域內的社會主義國家已陸續走向威權式國家主義的改革與開放，而較接近於資本主義的威權國家，亦以政治民主化和經濟自由化的國民主義式改革，迎向全球化的潮流；相對的，日本與台灣希望積極擺脫冷戰與內戰的遺留，故熱切的追求「正常國家」化，而南韓與中共，亦希望結束分裂國家的階段，以達成國家的統一。這種以主權國家爲基礎，重新調整內外政經形構與政經關係的趨勢，基本上是依各國的地緣經濟與地緣政治特性而展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從地緣政治的角度看，東亞地區由於特殊的地緣特徵—海洋與大陸的相對地理關係，以及深受東西冷戰下海陸爭霸格局的影響，兩大地理區域自韓戰以來，即分別採行不同的政經體制與發展策略，導致東亞地區隱然呈現海洋世界（以美、日爲首的資本主義國家）與大陸世界（以蘇聯、中共爲首的社會主義國家）兩大地理區域的戰略對峙關係，並具體展現於政治、軍事與經濟的對抗及衝突。這一海、陸霸權競逐的權力結構，在後冷戰時代，因蘇聯解體及美、日等國與中共展開「和平演變」與「反和平演變」的戰略攻防，而再度彰顯。東亞各國對戰略利益的界定，也順著此一戰略軸線而進行，並依序編排於此由地緣經濟與地緣政治兩大利益所交織而成的軍經運作體系中。

從地緣經濟的角度看，東亞地區事實上存在著三種主要的區域主義。首先，以美國爲首的先進工業化國家，希望配合以自由經濟爲基底的全球主義，而在區域內推動亞太一體化的亞太主義，作爲替代其在冷戰時代圍堵式的全球霸權結構。其次，全球主義或區域經濟合作潮流所隱含的更激烈競爭，和東西對抗鬆解後的區域強權爭霸，都使東協國家擔心更急迫的政經壓力，而全力發揚已有基礎的東協主義。另外，在分別聯結傳統上的大陸勢力與海洋勢力的同時，中共與日本亦分別強調不同內涵的東亞主義，以爲其爭取區域霸權的依據。因爲政經利害關係上的差別，三種區域主義之間事實上亦存在著各種聯合與衝突關係（蕭全政，2001）。

在 APEC 亞太主義之擴張中，東協主義者不斷表現其對建制化、正式化的抗拒。其策略之一，即一方面強化東協主義的發展，而推動東協自由貿易區的設置和東協的擴大；另方面，則提出「東亞經濟集團」（EAEG）與「東亞經濟會議」（EAEC）構想，以結合具東亞主義的國家，而制衡區域內的亞太主義者。其次，在安全層面上，東協各國亦致力於透過「東協區域論壇」（ARF）和「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CSCAP），而提升其在亞太區域安全體系中的主導地位。然而，在此其中，東協主義與東亞主義的力量，從開始之初即屬較爲微薄的，例如第一屆 APEC 會議正式名稱中的亞太（Asian Pacific），在第二屆年會之後即被改爲 Asia-Pacific，而使亞太的含義從「亞洲的太平洋」變成「亞洲加太平洋」，雖然東協主義者與東亞主義者，如中共，其本身對亞太的含義仍是「亞洲的太平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其次，基於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考慮上的差異，中共與日本在能凸顯亞洲主體性的「亞歐會議」（the Asia-Europe Meeting, ASEM）和「亞洲貨幣基金會」（the Asian Monetary Fund, AMF）構想上，也與東協主義者同調，但在中共支持東協的 EAEG 與 EAEC 下，日本卻反對。延續冷戰時代海陸爭霸的格局，日本式的海洋東亞主義者，顯然仍較偏向亞太主義，而中共式的大陸東亞主義者，卻偏向東協主義；隨著一九九一年兩韓的和解與反美情緒的滋長，以及九二年南韓與中共的建交和日益緊密的經貿關係，南韓似乎也將繼續強化其大陸東亞主義者的立場；盧武鉉政權的上台，似乎即表示這種趨勢的發展。二〇〇四年，南韓爲高句麗的歷史詮釋而和中共引起摩擦，但這似乎不足以影響大勢之所趨。

另外，區域主義在全球層次的三元對立，事實上亦影響亞太地區區域主義的發展。鑒於在 APEC 的形成與運作過程中完全被排除在外，歐盟於一九九四年與一九九五年先後提出新亞洲政策與新中國政策，而希望加強與亞洲國家的經貿、投資往來。另方面，鑒於一九八九至一九九五年間 APEC 中亞太主義的快速擴張，以新加坡爲首的東協國家，亦主張強化東亞國家與歐盟之間的關係；一九九六年三月，十五個歐盟國家，加上東協七國及中、日、韓，共二十五個國家的領袖，在曼谷召開第一屆的亞歐會議。該會議決議：以後每兩年召開一次領袖級會議；其間，則有涉及外交、財政及經濟的部長會議和各類資深官員會議，而主要的議程將包括政治對話、經濟合作和社會、文化領域的合作。亞歐會議的組織結構、運作方式和議程的內容，看來與 APEC 相當類似。

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一九九八年，二十五國領袖在倫敦召開第二屆的亞歐會議；該會議曾象徵性的議決成立 30.9 百萬歐元的亞歐互助基金（Asia-Europe Trust Fund），但對解決亞洲金融危機的實質幫助似乎不大。其實，歐盟和 APEC 中的亞太主義者，基本上仍都是偏向全球主義，故他們的基調都是經貿投資的自由化、便捷化；他們之所以競相爭取東亞各國而希望結盟，只因區域內外的利益有別，否則他們所強調的合作內涵其實都非常相近，故也都對 APEC 中的東亞各國主張「開放性的區域主義」（open-regionalism）。但是，對於東亞各國而言，與歐盟或與北美的合作，似乎都成效有限，以致於遂有轉而強化內部合作的努力。

臺灣土地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參與亞歐會議的東亞各國，在馬尼拉召開「東協＋3」的高峰會；會後發表一份「東亞合作的聯合聲明（the Joint Statement on East Asia Cooperation）」，而強調以外交、財政和經濟部長爲基礎的例行會議的重要。「東協＋3」的出現，意味著 APEC 中大陸勢力的進一步團結；亞洲金融危機以來，海洋與大陸兩股力量間的矛盾，顯然可能更強化，雖然不必然就會更激化。例如，以「東協＋3」爲基礎，而於二〇〇〇年五月通過的「清邁倡議」，已著手推動「亞洲貨幣安全網」的建構和「亞洲債券基金」（Asia Bond Fund）的設立；加上同年十一月開始醞釀的各種「東協＋1」、「東協＋3」版本的 FTA（free trade area）構想與行動，東亞各國的亞洲主義似已明顯的發展，而且也引起 APEC 中亞太主義者的警覺。

亞洲金融危機爲東亞各國帶來劇烈的貨幣貶值、惡性通貨膨脹、大量失業等嚴重社會問題；而亞太主義者所主張的經貿投資自由化、便捷化，甚至被認爲是導致該危機的罪魁禍首。另方面，亞太主義國家又拒絕多種被認爲有助亞洲各國化解金融危機困境的方案，包括馬尼拉架構與亞洲貨幣基金會的構想；亞洲金融危機因而引爆 APEC 中海洋國家與大陸國家之間激烈的路線之爭，以致於使 APEC 逐漸淡化經貿投資的自由化，而須更加強調貧窮、數位落差、婦女、青年及能力建構等經濟技術合作上的議題。亞洲金融危機顯然促使東協主義者和兩種東亞主義者，透過「東協＋3」的系統，而更強化他們之間的整合，並一起面對亞太主義者。加上軍事安全上的海陸對峙格局，亞太地區在後冷戰時期存在著很明顯的兩元對立關係，雖然軍事安全與經貿投資上的攻防分切線，並不完全一致。

肆、海陸爭霸與美日軍事同盟

在冷戰時代的東西對抗中，東亞地區的穩定與安全，基本上是依靠美國及其軍事盟邦所建構的安全圍堵體系來維護；以東西對抗下的海陸爭霸爲基本格局，美國的西太平洋安全體系，是以在日、韓、菲的駐軍爲主，而串聯包括東北亞到東南亞與澳紐的海洋島鏈。這種海洋勢力與大陸勢力之間的對峙、爭霸格局，基本上並不因爲冷戰的終結而改變，只是原來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認爲所以導致對峙的意識形態差異，已被爭霸與反霸的訴求所替代。

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爆發；中共的崛起可能威脅區域穩定的事實開始受到注意，而有九〇年之後的「中國威脅」論出現。面對中共可能帶來威脅的事實（尤其加上英國已確定在一九九七年將香港的主權移交中共），以美日爲代表的海洋勢力，一方面提出「和平演變」論，另方面也積極促成中共、香港和台灣同時加入 APEC；此外，美國也在一九九二年制定「美國香港政策法」（US-Hong Kong Policy Act of 1992），表達對於香港未來的穩定與發展的關心，並確立美國香港政策的基本原則。

冷戰終結後，一九九一年十一月，當美國已打完波灣戰爭而蘇聯正瀕臨解體之時，美國前國務卿貝克（James A. Baker, III），以「扇形」（fan-spread）戰略架構，解釋美國在後冷戰時代的亞太政策。在貝克的論證中，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和由美國及其盟邦所締結雙邊軍事條約爲基礎的「扇形」安全體系，將是美國亞太政策的三根骨幹。政治民主化涉及人權的保障和公民權的體現，必然將促使威權或極權政體的解構或轉型；而經濟自由化涉及經濟的市場化和政府角色的下降，正如 APEC 所主張者一樣。在「扇形」安全體系中，美國強調以其分別與日本、南韓、菲律賓、泰國和澳洲間的雙邊軍事盟約各爲「一根扇骨」，而美國則控制「扇底」，以致於構成「扇形」安全防衛體系的佈署（Baker, 1991）。加上後來陸續與美國簽約而願提供後勤支援的新加坡、汶萊與馬來西亞，這個「扇形」安全防衛體系，具體的形成海洋勢力對於大陸勢力（尤其是中共）的包圍。

當「扇形」安全防衛體系的佈署看來像是針對中共的另一種圍堵，加上政治民主化和經濟自由化，貝克的「扇形」戰略架構，儼然就是一幅完整的和平演變藍圖和行動。一九九三年，柯林頓總統在早稻田大學所提的「新太平洋共同體」（New Pacific Community）構想，基本上即是承襲這種三位一體的「扇形」戰略構想，只是他更強調美國式具普世價值的民主政治及區域性多邊安全會議機制的建立。當然，這種以「和平演變」爲目標的「圍堵」之特性，顯然與冷戰時代的「圍堵」不同，而只在防止對區域安全或穩定之威脅的擴大；故有人稱爲「軟圍堵」，有人稱爲「建設性接觸」（constructive engagement）。另方面，海洋強權對於政治民主化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經濟自由化的強調，顯然也會對所有仍處威權體制的東協國家產生壓力，儘管她們較能接受「扇形」安全防衛體系的佈署。

美國在西太平洋的安全防衛，向來非常仰賴美日安保條約。然而，在日本「和平憲法」的架構下，所謂的「美日安保」，其實就是「美國出力、日本出錢」的模式；包括一九九一年的波灣戰爭也不例外，日本出資一百三十億美元。日本憲法第九條規定：「日本國民衷心謀求基於正義與秩序的國際和平，永遠放棄以國權發動的戰爭、武力威脅或武力行使，作爲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爲達前項目的，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爭力量，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日本明白宣示：放棄戰爭、不保持戰力、不承認交戰權（劉冠效，2002：44）；日本顯然不是一個正常的國家。

然而，冷戰終結後，隨著「中國威脅」論的出現、主權國家意識的抬頭（反映在右派運動的蔓延）、「和平演變」的需要、九五與九六年的台海飛彈危機、九八年北韓的大浦洞飛彈事件，及二〇〇一年的恐怖主義與二〇〇三年美伊戰爭爆發後北韓的核武威脅等，日本事實上已不斷嘗試放棄「和平主義」，而重新走上武裝之路。一九九二年，日本通過「PKO 協力法」，允許自衛隊在當事國已達成停戰協議下，參與聯合國的維和行動；九六年，美日發表「美日安保聯合宣言」；九七年，修改美日安保防衛指針，將安保合作範圍擴及非地理區的「周邊有事」；一九九九年，制定「周邊事態法」，明定對於美軍軍事行動的後勤支援；二〇〇一年，通過「反恐特別措施法」，允許自衛隊在戰時派遣海外，雖然只對美國軍事行動進行後勤支援，而非軍事行動；二〇〇三年六月，更通過包括「武力攻擊事態處理法」、「安全保障會議處理法」，及修正「自衛隊法」的所謂「有事三法」，而完成自衛隊在保衛國土或支援美軍上所需要的作戰與動員之法律基礎（青年日報，2003/6/9，版 2）。小泉首相其實很希望能推動將自衛隊改成國軍的修憲，而徹底擺脫「和平憲法」的桎梏；日本顯然充分利用國際局勢的變遷，而逐漸邁向軍事大國之路（劉冠效，2002；汪曉風、陳霞，2002）。

日本的擴張軍事武力，事實上是在美國的支持下推動。九一年波灣戰爭之後，美國要求日本做出「看得見的貢獻」；九六年美日強化安保之後，美國亦要求日本更多的防務分攤；二〇〇〇年十月，小布希總統上台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由阿米塔吉（Richard L. Armitage）和奈伊（Joseph J. Nye）所主事的「阿米塔吉」報告，更直接指出日本憲法的相關規定，是美日同盟合作的障礙；九一一事件後，美國更要日本付諸行動，派遣自衛隊協助（劉冠效，2002：49）。另外，當小布希政府單方面廢除一九七二年的反彈道飛彈條約，而強化國家飛彈防衛體系（NMD）與戰區飛彈防衛體系（TMD）的建構時，日本事實上是一個重要的夥伴。日本在二〇〇二至二〇〇三年度的自衛隊武器採購總額，即約達 6300 億日圓，其中不乏是與美國 TMD 搭配的武器（傅可思，2002）；另方面，二〇〇四年十一月，正當台灣爲 6108 億軍購預算爭議不休之際，日本防衛廳披露中國可能攻擊日本的三種情況，而日本的軍事專家更因而呼籲與美國合作協防台海，甚至與台灣海軍聯手防禦周邊海域的安全（自由時報，2004/11/9，版 1）。

其次，在區域經濟合作方面，日本向來以美國的「全球經濟夥伴」自居，而偏好多邊主義的傳統，一直到二〇〇〇年後才逐漸改變。二〇〇〇年十月，吳作棟訪日，與日總理森喜朗，對外宣佈日、新之間將展開 FTA 協商；二〇〇一年一月，兩國開始談判，並於次年一月，簽署「經濟夥伴關係協定」（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爲了反恐與制衡中共的崛起，美國亦於二〇〇一年十一月，鼓勵日本參與更多的東亞事務。二〇〇二年初，小泉訪問東協，提出與東協建立全面經濟合作的構想；十一月，雙方共同發表有關建立全面性經濟夥伴關係的宣言；二〇〇三年十一月，兩者簽署「東協與日本全面性經濟夥伴關係架構協定」（Framework for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between ASEAN and Japan）。二〇〇三年十二月，日本邀請東協各國領袖在東京舉行高峰會；會後發表東京宣言，表示共同推動「東亞共同體」，以提昇彼此在政治和安全上的合作，並將在二〇一二年形成 FTA。另外，除爲立即的貿易之利而與墨西哥洽談 FTA 之外，亦主動與南韓接觸而開始 FTA 的研究作業。日本的努力，顯然是針對著中共，即與大陸勢力中的東亞主義者之間的競爭。

另方面，九一一事件之後，美國把恐怖主義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視爲是其國家安全的最大威脅；而其主要的根源，來自於貫穿加勒比海沿岸、非洲、高加索、中亞、中東、南亞和朝鮮半島的「不穩定弧形區」。利用「反恐」，美國曾將其勢力伸入阿富汗周邊的中亞與南亞，甚至駐軍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吉爾吉斯，而阻止中共西向的擴張。二〇〇三年六月，美國持續全面性調整其全球軍事部署；爲了「反恐」而不是打擊意識形態上的敵人，美國改變其對大規模、永久性基地的重視，而強調能機動應變的前哨基地。在東亞地區，美國準備調整在日本與南韓的駐軍，強化關島的安德森空軍基地、阿加尼亞軍港和阿普拉核潛艇基地的配備與裝備，並可能重新使陸軍進駐菲律賓、海軍進駐麻六甲海峽沿岸的新加坡與馬來西亞、空軍進駐澳洲，甚至海空軍進駐越南金蘭灣（國際先驅導報，2003/12/9）。爲了防守「不穩定弧形區」，美國的「反恐」部署，顯然也具有防止「新興崛起力量」打破現狀的「反中」意義；其中，美日軍事同盟的重要性，似乎也因而更加凸顯，而冷戰時代海陸爭霸的基本格局，也從而被延續下來。

伍、從「反和平演變」到「和平崛起」

一九七八年底以來，中共即在鄧小平的主導下，進入以「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爲核心的改革開放時代。冷戰終結後，面對和平演變的壓力，鄧小平於一九九二年初南巡中提出第二波的改革開放。鄧小平所主導的第二波改革開放，基本上是綜合十多年來的改革經驗與改革成果，而希望以「開放」觸動「改革」，而且在「四個堅持」下，「發展社會生產力、增強綜合國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確保具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之發展。鄧小平的改革策略，事實上具有「反和平演變」的戰略意義，即一方面讓中共能藉對外開放以吸納和平演變者所可能帶來的經濟資源和經濟機會（包括資金、技術、貸款、人才與市場等），另方面則以對外開放引導內部體制改革（包括金融、貿易、財政、產權與供銷體制等），而鞏固「具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之主體，並以之對抗「和平演變」的壓力。

從毛澤東「三線戰略」下的富國強兵到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中共的政經體制，已從中央計劃式閉關自守的極權社會主義體制，轉變爲容許市場經濟及對外開放的威權式社會主義體制。其間，從極權到威權，黨政軍，尤其是黨與軍，仍是控制與主導整體政經體制和變遷的主要力量；而在打破閉關自守並容許市場經濟的過程中，以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固守中國的主體性，並以重商主義追求經濟發展，且在國富之後追求強兵，

臺灣博碩士學術論文資料庫

似已成爲後冷戰時期中共推動政經改革的最重要總體戰略。

中共的經改，一般而言，在體制轉軌上，如國營企業，金融、外貿、財政體制，農工與區域均衡，中央與地方關係等，均可能隱含棘手的問題，而使經改面臨各種挑戰。另方面，黨政軍體制也出現了變化；黨仍然主管路線與政策，軍主管國防與治安，而政卻逐漸技術官僚化。其中，整體而言，軍對黨經改的保駕護航，直接讓黨與軍在經改中緊密結合，更使中共的經濟改革和軍事現代化變成不可分的連體；富國與強兵幾乎是一體的兩面，故經濟改革的成果，將大量被用於軍事現代化。這似乎也是「反和平演變」邏輯中不可少的一環。因此，無論是因爲冷戰終結後主權國家意識的抬頭，或爲了填補美蘇撤離東南亞駐軍而留下的「權力真空」，中共在一九九二年初即公佈其「領海與毗鄰區法」，而將深具爭議的南中國海各群島與散列島嶼，及台灣與釣魚台群島等，全劃入其領海範圍；另方面，中共也希望在二〇一〇年能將其防衛能力，從近海往東推出二〇〇〇公里，及於西太平洋第二島鏈的玻里尼西亞群島，而變成具有遠洋防衛能力的海洋國家。爲此，中共特別加強其海、空軍的軍備現代化，尤其是大量採購、引進舊蘇聯的海、空軍軍備。

在國際戰略方面，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十四大三中」前夕，中共國家計劃委員會提出「三個三角」戰略。透過大、中、小等三個「三角」，中共希望能掌握「小三角」、爭取「中三角」，以便與「大三角」周旋；其中，「小三角」即涉及中共與港台的統一，「中三角」涉及中共對東協國家和亞洲四小龍的拉攏，而「大三角」則涉及中共與美、日之間的爭鬥（李文志，1997：251-252）。很明顯的，「三個三角」戰略，完全是在配合以海洋勢力和大陸勢力交鋒地帶爲重點的「反和平演變」，而希望在「和平演變」的壓力下，使中共能從東向和南向中，找到美、日包圍下的緩衝地或突破口。

一九九一年波灣戰爭之後，中共開始體會大國的影響力，而推動大國外交；九五、九六年的台海危機之後，面對更爲強化的日美同盟，中共更積極推動與東協國家之間的睦鄰外交，而且開始突破「三個三角」戰略的格局，而強化與中亞各國及俄羅斯之間的安全合作關係。一九九五年，中共成爲東協的對話夥伴。一九九六年，以改善邊界關係爲由，中共與俄羅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斯、哈薩克、吉爾吉斯和塔吉克，成立「上海五國會議」；九六和九七年，五國元首分別簽署「關於在邊境地區加強軍事領域信任的協定」，及「關於在邊境地區相互裁減軍事力量的協定」。一九九七年二月，中共和東協之間成立「東協－中國聯合合作委員會」（ASEAN-China Joint Cooperation Committee）；七月，東亞金融危機爆發後，中共曾捐助 10 億美元，參與 IMF 對於泰國的貸款；十二月，在東協三十週年的非正式高峰會上，中共又承諾人民幣不貶值，而且提供 40～60 億美元，參與 IMF 的紓困計畫。

一九九七年四月二十三日，爲建立和俄羅斯之間的「戰略夥伴關係」，江澤民和葉爾欽簽署「中俄關係與世界多極化和建立國際新秩序的聯合聲明」；在聲明之中及事後，江澤民首度提出「新安全觀」。循著周恩來的「和平共處五原則」（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惠、和平共處）及鄧小平的「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不對抗、不結盟、不針對第三者），中共的「新安全觀」強調「各國有權根據本國國情，獨立自主的選擇自己的發展道路，各國不分大小、強弱、貧富，都是國際社會的平等成員，以和平方式解決國家間一切分歧和爭端，在平等、互利基礎上，加強和擴大經濟、科技、文化的交流與合作，促進共同發展與繁榮」（朱蓓蕾，2003：90）。循著「新安全觀」的精神，一九九七年十二月，江澤民在東協非正式領袖會議後，以「建立面向 21 世紀的睦鄰伙伴關係」爲題而演講，並在雙方聯合聲明中，強調在 APEC 及亞歐會議上相關事務的協商與合作；二〇〇一年之後，中共終於確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爲核心的「新安全觀」。

東亞金融危機提昇中共的國際威望，也提昇其自信；但是，東亞金融危機也讓中共了解世界市場的侷限性與不穩定性。要繼續維持快速、穩定的經濟發展，中共顯然不能只仰賴外在的世界市場，而須創造以內需爲導向的國內市場；一九九九年十二月，西部大開發因此而推動，何況平衡國內的區域差距與城鄉差異，亦有助於國民經濟的發展健全。此外，爲化解分離主義運動及進一步強化與中亞、南亞和東南亞各國之間的關係，甚至確保石油與其他戰略物資的取得等，西部大開發亦都有其極具正面的意義（邱成利等，2000）。另方面，一九九九年十一月，WTO 在西雅圖的部長會議因反全球化者的擾亂而癱瘓；中共作爲傳統上南方國家的領導者，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似乎亦因而體會其所擁有的更多機會。在強化以內需爲導向的發展模式之後，加上南北對峙的突顯，中共在二〇〇〇年後，似乎即逐漸跟上毛澤東的腳步，而走上世界爭霸之路；當然，她是以「反霸」而非「爭霸」的名義而訴求。

二〇〇〇年十月，朱鎔基表示願與東協國家簽署 FTA；一年之後，中共與東協成立專家小組，展開研究；二〇〇二年十一月，雙方簽署「東協與中國全面經濟合作架構協定」（Framework Agreement on Comprehensive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ASEAN and China），決定在二〇一〇年由中國與東協六國（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印尼、菲律賓、汶萊）先行成立 FTA，而其他四國（越南、寮國、柬埔寨、緬甸），則於二〇一五年加入。二〇〇三年十月，東協高峰會後，中共與東協發表「和平與繁榮戰略夥伴共同宣言」，希望加速 FTA 的談判，並在二〇〇五年前達成雙方貿易每年 1000 億美元的目標，以確保在二〇一〇年順利完成 FTA；爲此，中共又決定自二〇〇四年一月，開始執行所謂的「提早收割計畫」，而降低特定農工產品的關稅。除了形成 FTA 外，中共與東協的經濟合作架構協定，還涉及農業、資訊、人力資源及湄公河流域的開發等廣泛的合作事項。另外，爲促進雙方的經貿與投資關係，溫家寶也在該高峰會中建議每年舉行中國與東協的博覽會；二〇〇四年十一月三日，第一屆的「中國-東盟博覽會」在廣西南寧開幕。

另方面，二〇〇一年二月，中共號召東亞與澳紐地區的產、官、學界，組成「博鰲亞洲論壇」；六月，「上海五國會議」在強化多元合作內容後，加上烏茲別克的參與，改稱「上海合作組織」。該組織被認爲是體現中共「新安全觀」的第一個國際合作組織，而在「上海合作組織成立宣言」中，強調其宗旨是要「加強各成員國之間的相互信任與睦鄰友好；鼓勵成員國在政治、經貿、科技、文化、教育、能源、交通、環保及其他領域的有效合作；共同致力於維護和保障地區的和平、安全與穩定；建立民主、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成立之時，六國元首還特別簽署「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上海公約」。其次，二〇〇二年，中共也分別和相關的東協國家簽署「南海各方行爲宣言」，並召開「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會議」，而且另外與泰、寮協議，建設一條從昆明經寮國到曼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谷的跨國大道，而同時拉攏海洋的東協和大陸的東協（宋鎮照，2003：25）。

鑒於美國對中亞的擴張與美伊戰爭的爆發，二〇〇三年五月，利用聖彼德堡建城三百週年紀念的機會，胡錦濤訪俄，再度推動「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的新安全觀，而且商談有關北韓核武危機問題。同年六月，上海合作組織，除重申打擊「恐怖主義、分離主義和極端主義」外，開始觸及實際的經貿合作；八月，上海合作組織舉行多國聯合反恐軍事演習；二〇〇四年一月，上海合作組織的秘書處設立於北京，而六月，負責協調地區安全合作的反恐中心，亦成立於烏茲別克。另外，二〇〇三年的六月與十月，中共也分別與香港和澳門，分別簽署本質上仍屬 FTA 的「更緊密經濟夥伴關係安排」（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 CEPA）。中共似乎是以歐亞大陸強權的身分，主導並改善其與東南亞、中亞及俄羅斯之間的全面關係。

從「反和平演變」到西部大開發與東北老工業區的重建，中共的整個發展重心，從「向東傾斜」轉而爲「全國一盤棋」式的均衡發展；其次，在對外經貿關係上，也已呈現放射性的分散，而且逐步整合在國際經濟體系中。二〇〇一年年底，中共加入 WTO。然而，相對的，在軍事安全上，中共卻仍然面對美國的全面圍堵，無論是在東向、南向或是西向，尤其是美國利用反恐而全面性調整其全球性軍事佈局之後。二〇〇二年十一月，中共十六大後「胡溫體制」形成；爲了重新調整過時的「反和平演變」論和「三個三角」戰略，中共推出「和平崛起」論。

陸、中共的「和平崛起」戰略－反霸與爭霸

作爲一個大國，中共事實上不斷在反省其國家發展戰略（高恒，2000）。在冷戰終結後，從「反和平演變」到「三個三角」戰略，中共早期的國家發展戰略，主要是針對他們所認定的美國霸權在東亞的威脅，包括扇形的軍事圍堵、市場經濟的挑戰和西方民主與文化的衝擊等。但是，一九九五、九六年台海飛彈危機之後的美日軍事同盟，顯然讓中共了解其「三個三角」戰略的極限；而快速的經濟發展，尤其是在東亞金融危機之後，又讓中共有能力超越這個極限，並強化其與大國及周邊國家之間的關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係。另外，在國際組織的參與上，從聯合國、WTO、APEC，到「上海合作組織」與「博鰲亞洲論壇」等，中共事實上亦已擁有很多直接涉及國際政經規範與秩序的制定與維護，而得以發揮其影響。然而，這些對外層面的政策與經驗，又將如何結合整個改革開放政策和西部大開發等，而成爲連貫的所謂「和平崛起」戰略呢？

從「和平崛起」的字面上看，「崛起」是目的，「和平」是手段，但後者也可能是指時機、結果或目的（龐中英，2004）；然而，從實存過程上看，「和平」與「崛起」之間，其實隱藏著強烈的矛盾。基本上，「崛起是個大國的概念……是指你是受國際社會普遍關注的大國，重要到你是少數主要國家之一，或者是說你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國家……崛起的過程是地位不斷上升，和最強國家不斷接近的過程，這就涉及到是不是挑戰它的問題……怎樣做到又崛起又和平這是個兩難」（閻學通，2004：1）。在面對這個兩難上，鄭必堅與溫家寶對「中國和平崛起」論的詮釋，基本上都只限於強調國民經濟的均衡發展、社會主義的政經體制改革，及以中華文明爲骨幹的先進文明精神等能撐持「崛起」的內在條件，而對於可能衝擊「和平」的國際層次及軍事與安全方面的內涵，卻完全闕如，而只提到「堅持和平、堅持不爭霸」。但是，中共是否能以和平的方式而崛起，或是否將永遠不爭霸，這必須從其總體戰略思維的背景、目標與內容，才能進行較妥當的評估。

從戰略環境與長期戰略目標看，冷戰終結後全球「一超多強」的結構，及全球化與區域化政經勢力之間的競逐，一直是中共所注意而且在意的現象；在中共看來，這種「一超多強」，其實就是「美國稱霸大國反霸」的結構與過程（閻學通，2000：3-31），而全球化與區域主義之間的爭鬥，亦基本上反映這種「一超多強」的特色，只是還須加上被各個國際與區域政經組織所內化的南北之間的衝突。其次，亞太地區的海陸爭霸，及 APEC 所展現的亞太主義與亞洲主義之間的競逐，亦反映這種「稱霸與反霸」的特性。爲了「反霸」，在全球層次，中共講究大國外交、聯合南方國家，並利用各種國際組織（尤其是聯合國和 WTO），而參與國際政經運作與競賽規則的制定，以制衡「一超」的擴張和全球主義的發展，並強調多極化的趨勢；而在亞太層次，中共亦強調睦鄰政策與亞洲主義的擴張，以牽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制美國霸權和亞太主義的發展。中共自己宣稱，這都是針對美國的「稱霸」，而進行的「反霸」；但是「反霸」與「爭霸」，到底又有何差異呢?

自九〇年代中期後，關於「稱霸與反霸」的問題，中共的戰略學者似已從冷戰終結前後有關美國霸權是否衰微的辯論中（李文志，1997：22-27），形成相當一貫的理論；其中，Paul Kennedy 的《世界強權的興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1987），及 Samuel Huntington 的「文明衝突論」（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1993, 1996）對中共的影響，堪稱是最大。其影響所及，不僅見諸於中共有關「稱霸與反霸」的論述，也明顯的表現於所謂的「和平崛起」論上。

Kennedy 在一九八七年出版的《世界強權的興衰》，以經濟、軍事和意識形態三個層面，分析一五〇〇至二〇〇〇年間，世界強權的條件與興衰的過程。雖說他強調三個層次，但經濟其實遠比軍事還重要，因爲它是軍事的基礎、力量的根源；其次，Kennedy 指出，世界「經濟力量的中心」，在十六世紀之後已逐漸由地中海轉向大西洋和西北歐，而且自二十世紀初後又轉向太平洋，包括東岸的美國，及一九六〇年代後西岸的日本與亞洲四小龍等太平洋邊緣地區（1987: xxii, 441-442）。儘管 Kennedy 在成書之時對中共仍評價不高，但他對經濟的強調及經濟重心移轉的論述，卻似乎特別引起中共及其戰略學界的興趣。尤其在九〇年代初後，相對於大西洋邊緣的蘇聯解體與西歐的蕭條，中共的快速成長，的確使其戰略學界更相信「二十一世紀是太平洋世紀」；而且在日本長期的經濟泡沫化下，也認爲只有中國才能讓亞洲的太平洋地區成爲新的世界文明中心，因爲中國擁有全球五分之一人口，是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第三軍事大國，而且是東方文化的哲學基礎之儒學的發祥地（閻學通，1996：328-330），尤其至二〇〇三年，中共的 GDP 已達到 1.4 兆美元，僅次於美國、日本和德國。就此而言，中共的「反霸」，其實也顯然具有「成爲新的世界文明中心」的「爭霸」意義。

另方面，Huntington 在其「文明衝突論」中強調，自十七世紀現代國際體系形成以來，人類之間的衝突，已從以君王（princes）爲核心的階段、以民族國家（nation-state）爲基礎的階段，及以意識形態爲特色的階段，在冷戰終結之後，邁入以文明差異爲根源的階段。文明這個概念的內涵，

臺灣博碩士學術論文資料庫

可依如語言、歷史、宗教、風俗與制度等共同的客觀因素，及人們主觀的自我認同而界定；文明反映人們最高文化性群化現象，也隱含人們用以區隔其他族類的最廣泛文化性認同；而當代的衝突，不管是團體與團體之間或國家與國家之間，都將依各個文明的文化性斷層線而展開。其次，在以意識形態爲特色的階段結束之前，人類社會的主要衝突，其實都發生於西方文明之中，也就是所謂的「西方的內戰」（“Western civil war”）；但是，今後以文明差異爲根源的衝突，卻將發生在西方與非西方的文明之間和各種非西方的文明之中。換言之，在新的時代，非西方文明下的人們與政府，將不再只是消極的歷史標的（object of history）而任西方宰制，還將積極地加入西方世界，共同推動歷史、形塑歷史。在全球大致上可以分成七到八種文明之中，西方文明最應留意的是回教文明與儒家文明，尤其是兩者之間的結合；Huntington 所說的儒家文明，當然是以中共爲主要代表（1993、1996）。Huntington 甚至直接指出，自一九八〇年代與九〇年代以來，以中國爲中心，而包括香港、台灣、新加坡及其他東南亞各國華人的「大中華圈」（“Greater China”），更已形成不可忽視的政經勢力；「東亞經濟是愈來愈以中國爲中心，而且是由華人所支配」（1996：169）。

從戰略的角度看，Huntington 出版「文明衝突論」的本意，似乎是要提醒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國，注意到回教世界的存在與中國的崛起；但是，諷刺地，卻反而激發中共的覺醒和對文明與文化的重視，尤其幾乎全盤接受 Huntington 對中共的戰略性定位及對儒家文化的強調。因此，中共對於文明與文化的重視，可以具有兩層意義：首先，是將之作爲，如 Kennedy 所說的，有助強權興起的意識形態；其次，則是作爲 Huntington 所指出的，對抗西方文明或加入西方以共同形塑歷史的文化基礎。溫家寶強調中華文明與西方文明的「和而不同」（2003：4-5），即顯然將之視爲與西方抗衡或衝突的憑藉；而鄭必堅將「宏揚中華文明」視爲是「和平崛起」的精神支柱（2003：3），事實上除了將中華文明當成是與西方衝突的憑藉外，亦可視爲是有助強權興起的意識形態。因此，中共的「反霸」並沒有顯著的不同於「爭霸」，尤其加上要「成爲新的世界文明中心」的論述，中共的「反霸」事實上就是「爭霸」。

在「反霸與爭霸」的主軸下，中共「和平崛起」戰略的基本精神，似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乎可以歸納爲「獨立自主，改革開放」；而這樣的精神，基本上是承襲自毛澤東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和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一九六〇年代中，爲了與美蘇爭霸，毛澤東強調切斷與美蘇之間的經濟往來，而透過中央計劃式經濟體制，獨力的依「全國一盤棋」的方式，在文化大革命的改造下，推動社會主義的全面發展；而鄧小平卻是強調以開放促動改革，從改革中發展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相對淡化「獨立自主」（但八〇年代初後仍強調外交上的獨立自主），並且容許一部份人和地區先富起來。胡溫體制的「和平崛起」戰略，看來似乎是希望恢復毛澤東的「獨立自主」，但卻也繼續鄧小平的「改革開放」。

然而，如何將「獨立自主」和「改革開放」進行辯證性的整合，顯然將直接影響「和平崛起」戰略的基本內涵及策略性措施。在強調「獨立自主」上，中共除回到主權國家的立場，依「新安全觀」而推動和平外交，並繼續加強軍備現代化之外，在國內政經體制上，毛澤東「全國一盤棋」式的全面政經改革與發展，重新被積極的肯定，而有鄭必堅所說的，「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爲基本內涵的經濟和政治改革」，及以能統籌兼顧城鄉發展、區域發展、經濟社會發展及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等之各種利益關係的社會環境建設（2003：3）。對此，溫家寶甚至有進一步強調「自力更生」的傾向；他說，「在擴大對外開放的同時，更加充分和自覺地依靠自身的體制創新，依靠開發越來越大的國內市場，依靠把龐大的居民儲蓄轉化爲投資，依靠國民素質的提高和科技進步來解決資源和環境問題」（2003：3）。

相較於毛澤東的「獨立自主」，胡溫體制的「獨立自主」，是要揚棄前者的閉關鎖國，而代之以「改革開放」，而且是以肯定中華文明而非剷除中華文明，以豎立整個政經體制的基本精神；相對的，兩者的共同特點，就是要提升中共政經體制的主體性與整體性，以爲對外的「反霸」與「爭霸」做準備。強調區域均衡發展的「西部大開發」與東北老工業區的重建，固然是這類政策中的代表，而主張「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的「新安全觀」，亦屬這類措施中的典型；尤其這種「新安全觀」，不但有助於中共在凸顯主權與主體性下，繼續推動其大國外交、睦鄰政策與領導南方國家，而一方面維持和平的國際環境，另方面也能以和平的方式，進行對美

臺灣博碩士學術期刊資料庫

「反霸」，而且重塑多極化的國際政經新秩序（孫哲，2003；時殷弘，2004）。

其次，在「改革開放」上，胡溫體制仍延續鄧小平的政策；但是，由於內外政經情勢的變遷及對於主體性與整體性的強調，胡溫體制除仍重視面對全球化及國際市場外，其對改革與開放的順位，及對開放的領域與層次，似乎都已重新調整。首先，在改革與開放的順位上，中共似乎不再以開放觸動改革，而是在追求主體性與整體性下，以改革節制開放；開放是爲了綜合國力的提升，但須以主體性與整體性的發展爲前提。相對的，在開放的領域與層次上，將不限於經貿與投資層次，政治、軍事、科技、文化、教育、能源、交通、環保等領域的交流與合作，及如 FTA、區域主義與次區域主義等多邊與雙邊的層次，亦都是可以靈活運用的內容與範圍，只要這些領域與範圍能合乎「新安全觀」，而且有助於「建立民主、公正、合理化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

在強調「反霸」的目標下，中共「和平崛起」戰略的具體內容，其實很多都是針對美國的「稱霸」策略而發。例如，基於「文明衝突論」，美國推行所謂具普世價值的人權、民主、市場經濟與全球化，而且爲了「反恐」，也主張對所謂的「邪惡軸心」（the Axis of Evil），採取單邊主義的先發制人式「預防性」軍事行動；相對的，中共卻以中華文明爲基礎，主張各國文明「和而不同」的多元化，而且社會主義有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和人權觀，故應透過聯合國和大國外交的多邊主義，及「新安全觀」式的獨立自主與互信互利的合作方式，以維持和平的國際環境，並且發展公正、合理的國際政經新秩序。中共的這些主張，都是以顛覆美國霸權所主導的單邊主義和全球主義爲目的；她其實是以「反霸」爲名，而建構其「爭霸」戰略。

柒、結論與討論

回顧整個「和平崛起」戰略的背景和內涵，我們幾乎可以輕易的斷言，它是中共的一種新的霸權戰略，一種根據他們所認定的人類歷史發展階段（太平洋世紀的來臨）、當前世界的政經結構與變動趨勢（一超多強、文明的衝突及全球化與區域主義的矛盾），及中共的內部政經發展動態，而

臺灣博碩士學術期刊資料庫

形成的以「反霸和爭霸」爲中心，並整合內外政經社文政策的國家發展戰略。

中共的「和平崛起」戰略，希望以中華文明爲基底，對內建立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制度和均衡的社會環境，而對外則以「新安全觀」，透過睦鄰政策、大國外交及與南方國家的結盟，積極參與國際政經組織，而謀取國內外政經結構與關係的平衡，並促成多元化、多極化的合理國際政經新秩序，而完成「反霸與爭霸」的最高目標。中共的這個戰略，從概念上與程序上看，問題似乎不大；但是，若從實踐上看，卻可能隱含一些重大的矛盾。

首先，無論鄭必堅或溫家寶，都承認中共仍處於相對落後的階段，而且因爲人口眾多而面臨一個「大規模難題」，即「中國有 13 億人口，不管多麼小的問題，只要乘以 13 億，那就成爲很大很大的問題；不管多麼可觀的財力、物力，只要除以 13 億，那就成爲很低很低的人均水平」（溫家寶，2003：2）。爲處理這個「人多，不發達」的問題，鄧小平在一九八八年提出一個「三步走」策略：其第一步是希望在「改革開放」後，能先達到溫飽水平；第二步是在二十世紀結束前，達到小康水平；而第三步是在二十一世紀前五十年，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1988：266）。中共已在進入二十一世紀時邁入小康社會；鄭必堅與溫家寶都肯定這個事實，而且接受鄧小平的「三步走」策略，故同時強調在二〇二〇年之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並在「本世紀中葉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從過去二十五年的發展歷史看，中共從溫飽到小康的確相當快速，但也帶來嚴重的資源不足，包括石油、電力、水源與土地等。中共要如何取得充分的基本資源以支撐她的「三步走」構想，將可能爲整個世界帶來另一個「大規模難題」。

其次，在「和平崛起」戰略下，中共過去所一再強調的共產主義、社會主義，似乎只剩下與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相連結的政經體制意義，而其作爲引導整個社會變遷的意識形態意義，也已被宣稱由中華文明所取代。但是，社會主義和中華文明之間到底有何關係呢？特別是經過數十年的實踐之後，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是否已變成中華文明中的一部份，或中華文明是獨立於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之外的？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是否只如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Huntington 所說的是一種意形識態，而不是一種文明？那社會主義與中華文明和整體政經體制之間，又有何關係？這些問題似乎都是中共在強調以儒家文化爲基礎的中華文明時，所必然隱含的矛盾。

第三，中共強調要以「和平」的方式「崛起」，「堅持和平、堅持不爭霸」，但是，另方面，又主張「以自身的發展來維護世界的和平」（溫家寶，2003：3）。從實存上看，中共不斷強調對外開放及與全球化接軌，並積極涉入北韓核武問題的解決，及希望以和平方式解決南中國海島嶼主權的爭議；這都見證中共的善用及維護和平的國際環境，而且以和平的方式圖謀發展。尤其鑑於二〇〇八年北京奧運與二〇一〇年上海世界博覽會的召開，及完成小康社會的全面建設等，中共似乎都刻意強調其對維護國際和平環境的決心，並要積極利用國際和平的機遇期。然而，另方面，中共自一九九〇年代以來，即每年不斷增加國防軍費支出，二〇〇四年更增加 11.6%的預算。和平表示不戰爭、沒有戰爭；但對中共而言，「和平」也許只表示「不」戰爭，而不表示不準備戰爭或不擴張軍備以威脅要戰爭（閻學通，2004）。和與戰兩手策略，也許本來就有中共強調唯物辯證下的必然統一；但是這種「和」，還能算是強調和平、追求和平嗎？「和平崛起」又怎能去除「中國威脅」論的疑慮呢？

最後，與台灣直接相關的是，中共向來不願放棄以武力解決兩岸的未來問題，而且堅持「一個中國」原則與「一國兩制」。這樣的立場與態度，其實非常違反其睦鄰政策、「新安全觀」及整體的「和平崛起」戰略；而且，因而將台灣逼向海洋勢力，甚至變成美日軍事同盟中的一環。當然，中共亦以港澳簽署 CEPA 的模式，向台灣招降，只是在政治僵化中難有進展。在此其中，中共到底如何統合「和平崛起」與「台灣問題」之間的矛盾，將明顯影響兩岸之間關係的發展，及其「和平崛起」論在國際之間的公信度。在二〇〇四年三二〇大選之後，眼見台灣的主體意識愈來愈蔓延，中共是否會透過大國外交或其維護國際和平環境的訴求，而求助於美國的介入，正如北韓核武問題的六方會談一般，值得我們觀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參考書目

一、中文部份

大前研一著，李宛蓉譯，1996，《民族國家的終結》，台北：立緒。

石曉虎、司銀濤，2004，〈中國和平崛起面臨的六大安全挑戰〉，新浪網，http://news.sina.com.cn/c/2004-06-02/09182694569s.shtml。

朱蓓蕾，2003，〈全球化與中共安全觀：轉變與挑戰〉，《中國大陸研究》，46(6): 75-108。

自由時報，2004/11/9，版 1。

宋鎮照，2003，〈解析當前美『中』兩國亞太政策下的東南亞發展策略〉，《展望與探索》，1(7): 12-27。

李文志，1997，《後冷戰時代美國的亞太戰略》，台北：憬藝。

沈君山，2004，〈和平崛起的關鍵是台灣問題〉，新浪網，http://news.sina.com.cn/c/2004-08-13/17454028555.shtml。

汪曉風、陳霞，2002，〈日本戰後防衛政策的演變及走勢〉，《現代國際關係》，5: 30-34。

邱成利、王增業和王圳，2000，《西部增值》，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

青年日報，2003/6/9，版 2。

孫　哲，2003，〈結構性導航：中國『和平崛起』的外交新方略〉，《世界經濟與政治》，12: 58-63。

時殷弘，2004，〈人大教授時殷弘：中國和平崛起需要五大『平台』〉，國際先驅導報，http://news.sina.com.cn/c/2004-03-22/17523052483.shtml。

高恒主編，2000，《2020 大國戰略》，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

國際先驅導報，2003/12/9。

傅可思，2002，〈日本自衛隊購武計畫概覽〉，《廣角鏡月刊》，360: 38-41。

新聞周刊，2004，〈“和平崛起”指引中國未來〉，http://www.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chinanewsweek.com.cn/2004-05-09/1/3524.html。

溫家寶，2003，〈溫家寶總理哈佛演講：『把目光投向中國』〉，人民網，http://test.peopledaily.com.cn/BIG5/shehui/1061/2241298.html。

劉冠效，2002，〈轉變中的日本安全保障政策－『反恐特別措施法』的探討〉，《問題與研究》，41(5): 41-65。

鄭必堅，2003，〈中國和平崛起的新道路和亞洲的未來〉，《學習時報》，11/3。新浪網，http://news.sina.com.cn/c/2004-03-21/09452100725s.shtml。

鄧小平，1988，〈要吸收國際的經驗〉，《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頁 266-267。

學習時報，2004，〈中國和平崛起面臨兩大“坎”〉，中國新聞網，http://www.cas.cn/html/Dir/2004/08/31/3971.htm。

蕭全政，2001，〈東亞『區域主義』的發展與台灣的角色〉，《政治科學論叢》，14: 201-222。

閻學通，1996，〈二十一世紀的中國與亞太〉，薛君度、陸忠偉編，《面向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周邊形勢》，北京：時事出版社，頁 313-330。

閻學通，2000，《美國霸權與中國安全》，天津：人民出版社。

閻學通，2004，〈閻學通－『什麼是崛起？』〉，國際先驅導報，http://news.sina.com.cn/o/2004-04-08/10362256184s.sbtml。

聯合報，2003/12/16，版 13。

龐中英，2004，〈構築和平崛起的國家戰略：崛起不是爲了復仇〉，中國青年報，http://news.sina.com.cn/c/2004-03-26/04122141711s.shtml。

二、英文部份

Baker, James A., III. 1991. “America in Asia: Emerging Architecture for a Pacific Community.” *Foreign Affairs* 70(5): 1-18.

Huntington, Samuel P. 1993.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72(3): 22-4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Huntington, Samuel P. 1996.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Kennedy, Paul. 1987.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New York: Random House.

Peck, Jamie and Adam Tickell. 1996. "Searching for a New Institutional Fix: The After-Fordist Crisis and the Global-Local Disorder." In *Post-Fordism: A Reader*, ed. A. Amin. Oxford:Blackwell, 280-31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
期刊資料庫